

郭冰茹◎著

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 性别建构

“新女性”的生成

性别建构的主题起点战争中的性别越界

红妆与武装

“思想解放”语境中的性别重构

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遭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冰茹◎著

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 性别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郭冰茹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675 - 0245 - 1

I. ①2… II. ①郭…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921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

著 者 郭冰茹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8.2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0245 - 1 / I · 938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章 “新女性”的生成 / 24

一、知识界塑造“新女性” / 24

二、“新女性”的社会生活 / 40

第二章 性别建构中的主题起点 / 59

一、同性情谊与“新家庭”想象 / 59

二、爱欲、身体与革命 / 76

第三章 革命、战争与性别越界 / 90

一、不爱红妆爱武装 / 90

二、蚁民们的生存哲学 / 106

三、乱世、俗世与日常生活 / 120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宰制下的性别 / 136

一、妇女能顶半边天 / 136

二、性别的消隐与呈现 / 161

第五章 “思想解放”语境中的性别重构 / 177

一、性别意识与宏大叙事 / 177

二、重回“五四”起跑线 / 193

三、“性”与性别 / 213

第六章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路径 / 228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操练 / 228

二、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 241

导 言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书想做的学术工作是:以讨论现代女性性别建构为基本脉络,重视而非单一地讨论女性写作,始终突出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的关联性,尝试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讨论女性写作的发生、发展与转型。因此,与其说本书是讨论现代女性写作,毋宁说是在询问与女性性别建构相关的问题。当我们不完全借助单一的文学文本进入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时,关于一种文学现象产生和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才有可能被进一步揭示。因而在讨论现代女性写作的兴起时,我们有必要关注与其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即: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元叙事的组成部分之一,“女性解放”的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女性又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这些问题贯穿全书,也集中反映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困惑。

一

女性问题在中国或许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任何

一种理论在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时,似乎都应当正视女性问题的中国特征,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性别建构对女性写作的影响以及我们涉及到作家、文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因此,在以女性主义理论支点、选择性别视角去关照历史、审视现实时,我们首先要对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清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如何论述中国女性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现成的结论是男尊女卑,女性不仅处于弱势的位置,而且没有成为具有独立意义上的性别主体。我对这个概述性的结论并无异议,但是当我们以对群体的概述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时,便会发现,关于妇女历史的论述存在不少偏差。

比如我们认为女性在历史上没有政治地位,但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特别是贵族妇女,太后干预朝政就是汉代历史的一大特色,而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女性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都是不同的。所以“五四”时期讨论妇女解放会牵涉到阶级,陈望道总结说:“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灭‘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①而说到参政问题,在清代功名最甚的乾嘉时代,有功名的人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1%,^②虽然女性不能考取功名,学而优则仕,但男性能参政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认为历史上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完全

① 陈望道:《我想》(二),原载《新妇女》第4卷第4号,1920年11月15日。

② 出自李伯重的发言,见《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41页。

没有经济能力,对婚姻和家庭的依附性非常强,而这是女性处于受奴役地位的症结。但是在唐代的一些户籍文书、赋役文书、契约文书或其他一些账目案卷等实际记载当时社会状况的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女性户主,她们或者是寡妇,或者是单身女性,承担着赋税的责任,她们独立的经济地位为地方官府和左邻右里所承认,显然这个“内”与“外”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此外,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到了18世纪的清代,很多地区女性的经济地位实际已经超过了男子。

在文化方面,女性受奴役受压迫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比如守节的问题,明代官府提倡寡妇守节,但民间女性再嫁现象依然盛行,缺乏生活来源的寡妇为生计所迫往往选择再嫁,而她们的亲族、夫族也往往要求她们再嫁。清朝满族女子守节的很多,这与八旗制度保障寡妇生计有关。当然除了经济因素,夫妻的情感因素,女性的生理因素都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一些个案,我当然不能也无意凭借这些个案来抹煞历史上女性的卑劣地位和受奴役受压迫的基本事实。相对于浩大的历史,我想说的是,这些个案所带来的问题,启示我们或许应该在性别的视角中加入其他一些与性别相关或者无关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性别问题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包括风俗习惯等相关联而非相剥离的一个“集合体”。比如官方宣扬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私人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不同的阶级/阶层、经济水平、地域、社区/生活圈、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所造成的个体差异等等。如此,才可能贴近丰富的、复杂的女性生活史和社会史,才有可能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理论所建立起来的批评视角和言说立场。

由此我们发现,晚清以来现代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始终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元叙事相关联的,女性性别建构的起伏沉浮,都深刻地打上了元叙事的烙印。

晚清的大变局,让女性解放的问题成为可能。事实上,变法维新与女权运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二者的联系,除了社会变革可能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影响外,还得益于晚清维新人士将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与“强国保种”的国家诉求勾连在一起。由是女性解放的话题从一开始就被置入政治体制的变革之中,因而作为社会伦理的女性问题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1902 年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明确地体现了维新党人在“国家”范围内讨论“女性解放”的思路。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将罗兰夫人安置在国民之母、文明之母和革命之母的圣坛上,供后来者学习和效法。^① 当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令妻“受命于家”而与国家、民族绝缘时,维新人士把女性与“强国保种”联系起来便为女性走出家庭,登上社会舞台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合法性。

“百日维新”之后,不论是倡导女子独立还是呼吁女子自省,对女性问题的关注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女界之卢梭”金天翮在他的《女界钟》^②中将爱国与救世认定

① 梁启超文章开篇既言:“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参见《罗兰夫人传》,《新民丛报》,第17—18号,1912年10月。

② 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妇女思想史上最早的一本系统全面阐述女权革命理论的小册子”,见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第206页。

为“女子的本分”；《女学报》的主笔陈撷芬也强调女子应该自谋女学和女权，以“备教育后来国民之用”。^① 在《独立篇》和《女界钟》之后，出现了大量出自女性手笔，鼓吹男女平权和女子独立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各有侧重，但将女性解放与国家兴衰相连接则是当时的共识。而与此同时，女界也开始反省女子自身存在的问题，显然，这些反省也是指向国家兴衰的。

但是，女性何以弱勢？辛亥之前的女权倡导者们虽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控诉社会对女子的不公，大力倡导女子解放，却从未有人清算过这种不公的思想文化根源，他们甚至在新学失衡，新女界出现种种弊端之后把旧学视为最终可以坚守的底线，比如丁初我就断言“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容有新文明”。^②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才触及到思想文化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正是从女子问题入手的，新文化运动借女性在家庭、婚姻、贞操、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来批判礼教，来确立“个人”但这个“个人”并没有具体的性别指向。叶绍钧所强调的“独立健全的人格”，邓颖超呼唤“起来哟！勇敢的起来，做一个真独立的‘人’吧！”^③ 以及子君那句经典对白“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适用于每一个想要冲破旧家庭桎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并在与国家民族天然的同构关系中获得了自身的性别认同；女性同样也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只是这个“自己”是与男子一样的“人”，她也需要和男子一样建立起与国家民族的同构关系，

① 陈撷芬：《独立篇》，载《女学报》，1903年2月27日。另：此《女学报》并非维新人士所办的《女学报》，而是《苏报》所附之《女报》的改版。1902年5月创刊，独立月刊，主编和主笔为陈撷芬。

② 丁初我：《女界之怪现象》，《女子世界》第10期，1904。

③ 邓颖超：《姐妹们起来哟！》，原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1923年3月。

才能确立自己的性别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倡导人的解放和青年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时,将女性解放纳入这一话语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思想界对女性问题的特别关注,也暗示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晚清以及民国初年一样,它只能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中顺势跟进。

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从属性,由于男性推手对妇女解放思潮的领导和介入,诸多关乎女性切身感受的问题无法得到深入的思考,比如从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如何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献身社会事业/革命的女性是否真的因此而改变了女性的宿命等等。而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在五四退潮以后,特别是在革命和战争到来以后,就变得十分的紧迫和复杂了。

救亡压倒启蒙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中国的一种叙述。如果我们撇开对此的辨析和歧见,可以肯定的是,与个性解放、性别建构相关的五四思潮退场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民族国家的主流叙事和政党意识形态。此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晚清提出“强国保种”、五四倡导“个人解放”已经有了历史语境的不同,但其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大格局并没有改变。在这个大的框架中,革命、政党、阶级、民族等开始成为性别建构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性别建构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与相关因素的冲突也更为激烈。革命和战争促成了性别越界:比如丁玲放弃了“莎菲式”的个人追求,投身了革命;比如张爱玲,借了沦陷区新文学的退场而成为耀眼的作家明星;比如萧红对革命既有所介入,又有所疏离。这些不同的选择,不仅留下了大时代中的理想,也留下了至今难解的困惑。三十年代的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依然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复杂的历史。

1949 年开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国体的新中国似乎终结了既往的历史,但性别建构仍然是为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服务的。和

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相比,新中国对妇女地位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带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女性的塑造和限制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类似于“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的标语口号使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消隐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革命目标中;另一方面,建构在性别基础上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以及二元之间“主/从”的关系,却使性别以“军/民”、“党/群”、“领袖/士兵”等意识形态方式呈现了出来。如果说,五四时期有个人的解放,却没有具体的性别指向,那么在这个时代,性别指向的目标明确了,个人却消失了。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重回五四起跑线”,但逐渐展开的现代化建设则为性别建构提供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代女性再一次面对婚姻、家庭、职业、爱情等性别建构的基本问题,她们对五四前辈思想资源的继承和拓展构成了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也成为自晚清开始,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性别建构问题的一个终点,抑或起点。

自五四始,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充分反映在女性写作之中,而女性写作本身也成为性别建构的一种方式。女作者在“五四”时期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晚清不断推进的女子解放和维新派确立起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巨大感召力为其出现孕育了条件,而投身写作为刚刚获得“解放”走入社会的青年(包括女青年)提供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和经济独立的可能,尽管在当时,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或者限制。

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女性有了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别建构也有了被表述的可能。这正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变动过程中知识界塑造女性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化,始终是在“他者”的影响下进行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它总是以大势规定女性解放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位

置和顺序,因此女性解放始终是这一元叙事的一部分。知识界则是另外一个“他者”,它在完成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塑造女性。这是“他者”之于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但是,历史的规定和知识界的塑造,也使女性解放带有了宿命性的困境,她们始终想在独立的意义上构建自己,形成自己的叙事。因此,当女性能够以文字的方式介入社会、国家时,当女性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时,女性写作之于文学史的独特意义也就显示出来。

其后,无论是现代女性建构的历史,还是女性写作的历史都显示了历史大势的巨大影响。丁玲在 1942 年的检讨预示了女性话语面对民族国家话语巨大力量之后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绵延至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当 1980 年代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风靡中国大陆时,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自认并非只为女性而写作,而如果将其的写作限定在“女性”的范围之内,那么则局限了她们的写作意义。

二

如何叙述 20 世纪中国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以及作为性别建构言说文本的女性写作,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女性主义理论是我们讨论性别问题的切入点之一。

Feminism 在中国大陆先后有两种译法,1989 年之前学界多采用“女权主义”的译法,在内容上侧重早期妇女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到 1992 年以后则基本改用“女性主义”的译法,注重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表达。有学者在讨论这个译法时指出:“海外有关的华人学者认为,这两种译法都存在偏颇、片面与局限性。‘女权主义’太求政治色彩,容易掩去其他,而‘女性主义’则性别意味过

浓,无法传达‘Feminism’在发展中日益加重的政治涵义。权益之计,‘女性主义’成了眼下与国际‘接轨’后的通用术语”。^① 本书也将采用“女性主义”的“通行”表述,虽是以性别特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但并不忽略其政治涵义及其与具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

在西方,成规模的女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均是伴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而形成的。在女性文学的热潮中,文学评论为建立女性文学的理论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且迅速地由政治运动走向整体的文化批判。1983 年国内开始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些经典著作也先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比如《女性的奥秘》^②、《性与文本的政治》^③、《第二性》^④、《性的政治》^⑤等。

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推动下,1988 年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兴盛起来,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比如《文学评论》、《上海文论》、《外国文学评论》等上都逐渐开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专栏,产生了一批以女性为主体的学者和一批有学术含量的论著。1995 年以后,随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借此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女性主义为理论视角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版,有条件的高校纷纷开设了相关课程并且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以女性或者女性主义

① 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3 期。

②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③ 陶里·莫伊:《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赵拓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④ 波伏娃:《第二性》,曾以《女人是什么》为出名被部分译出,王友琴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全译本《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⑤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为关键词的研讨会时常举行,女性主义似乎成了一时的显学。

但是,当“女性主义”成为一个标签被随意张贴的时候,对文本中“性别被压抑”的过渡解读,对性别意识的过渡阐释以及分析论证中过渡的理论膨胀常常偏离了女性写作本身,同时也使“女性主义”、“女性写作”陷入困境。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肯定女性经验的权威性,从而为阅读提供一种新视角;其二是女性批评(La gynocritique),研究妇女作品的历史、类型、主题、结构、女子创作心理、女子个人或集体的创作生涯轨迹以及女子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①就女性主义理论自身来说,妇女解放运动中倡导“男女平权”的性质决定了女性的书写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与颠覆性。但是对女性写作中所确立的性别立场进行近于极端的解读使人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便是:妇女解放运动本身是否是一场权力之争?打倒了男性是否就意味着女性获得了解放?女性是否可以仅仅通过以暴易暴而无视自身文化建设获得解放?放逐男性而任女性的身体和欲望肆意流淌,是否真正使女性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使女性写作真正建构起了女性文化特质?肖瓦尔特曾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针对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想对传统的男性的文学观加以修改和匡正,却反而使其更加依赖这种文学观,同时妨碍自身理论建设的现实指出:“只要我们仍仰仗男性中心的范式来规定自己最基本的准则,即使加上一个女权的参照系作为修正,

① 伊莱恩·肖瓦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收入《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漓江出版社,1991。

我们也学不到任何新东西”。^① 此外,她也针对女性美学认为存在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如果一个女作家否认自己的女性特征,那么她的艺术将受到限制甚至削弱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只要女性美学认为唯独妇女才有资格阅读妇女的文本,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受孤立的危险”,便会无可避免地落入“性别本质论”的窠臼,从而限制自身的发展。^②

肖瓦尔特揭示出女性主义批评具有“颠覆”和“极端”的两面性,这在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充分反映出来。一方面,“女性文学史”终于从文学史中独立出来,女性被歧视的文化偏见受到批判,大量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女性写作成为文学史的专门概念,而女性主义理论也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写作;但是,另一方面,当“女性主义”成为一个标签被随意张贴的时候,对文本中“性别被压抑”的过渡解读,对性别意识的过渡阐释以及分析论证中过渡的理论膨胀常常偏离了女性写作本身,同时也使“女性主义”、“女性写作”陷入困境。

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首先来自于理论与历史语境的差异。在西方,“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也是女权运动的革命纲领。从对社会结构的触动来看,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这场革命都不彻底,因为核心家庭的存在是男权制得以继续存在的保证,正如凯特·米利特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完全由家庭成员组成的社会里,女人不愿意放弃在家庭里的依赖和安全,男人同样也不愿放弃传统的地位和特权,所以,尽管人们谈论性别平等,却很少有人愿意将其付诸实施。^③ 而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还有

① 伊莱恩·肖瓦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收入《最新西方文论选》。

② 伊莱恩·肖瓦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③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

其特殊的原因。这场运动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民族斗争、民主革命的附属物,她不仅缺乏独立的斗争纲领和明确的性别意识,甚至缺乏女性参与者的自觉。这场革命即便胜利,也只能是少数女性参与的社会革命的胜利,并不能唤起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的觉醒。而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女性接受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这近于坐享其成的胜利成果,但同时这种从天而降的平等也成为女性的一种强制身份。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其在嫁接西方理论时难免接出强扭的瓜。

而国内自身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写作实践又往往陷于不断重复的循环论证中。原本,理论与实践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女性意识的自觉产生女性写作,对女性意识的理论提升产生女性主义理论进而指导女性写作。但国内的批评在进行女性文本的解读时往往仅仅从女性文本中收集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之后再服务于创作实践,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行循环论证。这样的循环论证在最初的时期里的确促成了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发展,但随着写作实践与批评理论的发展,这种方法只能越循环越封闭,成为一种自我论证。此外,女性主义批评还具有某种排他性,王小波在对陈染《私人生活》进行批评时做了一个“单向闸门”的比喻,他说一个女性写作的文本,男性批评家如果说不好,就会被认为是男权的偏见,如果说好,那么他的批评在一大堆颂扬的文字中就显得无足轻重,“单向闸门”的作用便是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① 这种接受批评的态度无疑会在无形中压缩女性写作开拓与发展的空间,使女性写作在单向的文学批评中将自身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女权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女性主义”要成为启蒙女

^① 王小波:《〈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载《北京文学》1996,第11期。